

历史唯物主義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

第 六 辑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

第 六 辑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北京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3/4 字数：318千字

1984年 12 月第一版 1984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2235·20 定价：1.80元

目 录

学习胡乔木同志文章，把思想理论工作

提高到新水平……………邢贵思（1）

论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吴元梁（23）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把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化……………王韵清（41）

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几个问题……………高纪辉（57）

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的几点不同看法……………赵 恕（68）

试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定义和内容……………马国庆（83）

异化、异化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凌力学 解战原（9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异化观的根本区别

……………李文成（111）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形式

——学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冯 穗（123）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中的作用……………赵常林（137）

唯物史观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闰树森（149）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王璿霞（160）

简论唯物史观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运用和发展…苏厚重（173）

梅林在捍卫和传播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贡献……………金隆德（184）

拉布里奥拉与唯物史观……………余其铨（201）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王秀芳（214）

关于普列汉诺夫对阶级斗争

及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述……………曾盛林（230）

试从系统论观点谈几个历史唯物论原理……………徐大芴 (245)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

由来、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樊万寿 (257)

消费结构·分配制度·精神文明……………庞元正 (271)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探讨……………许惠农 (286)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与“辩证唯物

主义”概念的演变

——兼与王贵秀同志商榷……………何 畏 (297)

知难而进，努力反映时代精神

——评《哲学原理疑难问题探讨》…刘行焱 王玄武 (310)

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

(苏)列·尼·苏沃洛夫《唯物辩证法》第二章节译

……………易杰雄 (320)

研究资料：

社会主义异化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331)

学习胡乔木同志文章， 把思想理论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邢 贲 思

今天我要谈的完全是自己学习乔木同志文章的一些粗浅体会，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准备谈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说前一段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宣传中出现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思潮？为什么乔木同志把这场争论提到两种历史观争论的高度？第二，怎样理解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把人道主义作这样的区分有什么意义？第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为什么不对？为什么说这样的命题是混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典型命题？第四，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第五，怎样理解异化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乔木同志文章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

我们曾经听到一些同志的这样一种说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为什么要中央出来讲话？为什么要乔木同志亲自出来写这样一篇大文章？这样做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小题大作，是不是大惊小怪？这样做是不是干预了学术理论界的百家争鸣？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乔木同志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这场讨论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之争。固然，人道主义和异化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但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而在前一段的讨论中、宣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就在于有些同志的文章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而且诱发了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信任情

绪。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之争，不是你对异化如何理解，我对异化如何理解，你对人道主义如何理解，我对人道主义如何理解的问题。这样的估计有没有根据？这种估计是不是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我在这里不妨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材料。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量的文章是发表在1978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据粗略统计，到去年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前，这方面的文章共有六、七百篇。当然，情况很不一样。有的文章的确属于一般学术理论文章，但是也确有少量文章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这就不是简单的学术理论探讨了。比如有的同志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在看来已经陈旧了，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讲人，忽视了人，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叫做见“物”不见“人”。光讲经济关系，光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而不讲人的因素。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对人的研究，问题在于怎样去研究。其次，有的同志的文章明确讲，人道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潮，从古至今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各个时代都有这种思潮。人道主义是各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全人类的进步思潮。所以，马克思主义也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人道主义和不是人道主义的区别，而是人道主义的这一种类型与那一种类型的区别。这就从历史观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还有的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公式，即“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也有些同志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是沿着“人——非人——人”的公式发展的。这就是说，社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后来出现了阶级，人类发生了分化，人转化为非人，共产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人在发展了的形态下又回到了原来的真人的地步。这种分析明显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就因为它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共产主义是真正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的制度，是人类本性的真正体现。这种说法很难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学说划清界限。历

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都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好，就在于它符合人类的理性。远的不讲，起码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家，即傅立叶、圣西门、欧文，都是这样讲的。这种学说之所以是空想，就在于它没有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把它归结为合乎人类的理性。关于异化问题的错误观点就更多了。有些文章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处存在着异化，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表现。有的人认为，这些异化现象的根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造成异化现象。有的同志就明确地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带来异化。这样讨论问题的方式很明显是超出了一般学术理论的范围，它的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这不是对某些具体的领导人有意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或某些具体制度有意见，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必然造成异化。当然，这些同志没有得出这样的直接的政治结论。但他们的逻辑发展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这一点，乔木同志的文章讲得很深刻，他指出：“一个思潮有它自己发展的必然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理论在根本方向上不正确，就难免引起很不好的社会效果。”这就是说，假定你的理论的前提不对，不管你本人的主观意志如何，它的发展的逻辑结果往往不以你立论者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也许这些同志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立论的根据是权力高度集中，这种根据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要不得，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动机为转移的。由于这种理论上的失误，注定会导致你始料所不及的后果。所以，乔木同志的文章一方面在理论原则上严肃地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一方面在分析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时又是很细致的，他分析了出现这些错误的历史背景，其中重要的是“十年动乱”这个背景。有些同志之所以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就是要对“十年动乱”进行思索。“十年动乱”时期确实有很多反人道的现象、摧残人格的现象，所以有些同志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大家对此有所警觉，讲

了这种观点。这种思索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结论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的后果是不好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前一时期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的实质是什么？用一句话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总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行了，需要用人道主义加以补充，加以纠正。有些同志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人道主义，只是后来被人们歪曲了，所以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不管是哪一种看法，总的意思都是要用人道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说得严重点，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意义上都反对人道主义。但是，笼统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行，要用人道主义来补充，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断然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根本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并没有区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也不是要求继承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而是笼统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主义，应当用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原则界限。这样宣传的实际结果是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正如乔木同志所讲的，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一些青年的思想所起的腐蚀的、蛊惑的作用。

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首先这种宣传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影响不小，有一些文艺创作实际上是在人道主义的指导下创作的。比较典型的是《离离原上草》，这篇小说的基本主题是用人性的圣水化开阶级仇恨的疙瘩。其中所讲的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将军，一个是我们的干部（开始是一般干部，后来成了领导干部）。小说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把几十年国共两党的斗争完全说成是误会，是多余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农村妇女，很善良，人性很美，她用自己人性的圣水化开了多年来两个冤家的疙瘩。很明显，这种主题第一是违背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的真实，在实践中也找不出

这样的例子，第二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文艺作品不能图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文艺创作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能借口反对图解马克思主义，任意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历史的真实。这部作品是很典型的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当然，这个作品的作者已经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有所认识，这是很好的。但是，这部作品的倾向性是错误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文艺作品能不能写人性，能不能写人情味？答案是肯定的。文艺作品当然可以写人情味，可以写人性，包括可以写爱情。如果这些都不能写了，还叫什么文艺作品？那样的作品还有谁愿意看呢？所以，乔木同志的文章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指出当然可以写人情味，写人性。问题是怎样写，写什么。象《离离原上草》那样的写法是不行的。这种写法虽然写了人情味，但是令人看不下去，因为它违反历史的真实，所以没有生命力。这种写法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图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念的图解。

这样一种宣传在青年学生中造成的思想混乱也是很突出的。八十年代的青年有一个可爱的地方，就是善于思索，求知欲很旺，看书也很多，特别是掌握了外文工具，可以直接阅读西方书籍，知识面广，对西方的东西知道得很多。但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错误思潮的宣传，使青年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怀疑。究竟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人的价值？青年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是很多的，所以，乔木同志特别讲到要以这篇文献给一切探讨人生意义、人生目的的青年。青年喜欢思索，喜欢探讨人生的目的，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这都是很好的，应该鼓励的。年纪大的人不要横加干涉，关键是加以引导，这是因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截然相反的关于人生意义和目的的看法。青年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事业的主要接班人。假定把青年的思想搞乱了，那我们今后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假定青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行，要**靠人道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人道主义才能救中国，萨特那一套才能救中国，萨

特尔那一套要比马克思主义高明，而且还要追求什么自我造就、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把他人是地狱之类资产阶级存在主义观点及其他一些这样的观点当作自己的理想、信念，那我们将来的前途就很值得耽心了。当然，对当前青年的思想要一分为二，他们的主流是好的，思想活跃，求知欲很旺，政治上很敏感，关心国家的大事。完全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算盘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当前青年的思想情况是相当动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各种西方的错误思想向他们袭来，国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也向他们袭来，使他们很难辨别方向。所以，现在的马克思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没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来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青年的头脑中思索了许多问题，要求我们回答。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或者对这些问题理解得不够，重视得不够，或者是回答不清，研究得不够。比如有的青年讲，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可现在怎么还没有腐朽？资本主义怎么还在繁荣呢？怎样认识现在西方的情况？对这样的问题只是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说它们早晚有一天要灭亡，又有谁能接受呢？我们自己对西方的情况缺乏理解，缺乏研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见解，你怎么能说服八十年代的青年？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肩负着很重的责任，一方面要对青年负责，对他们加以指导，同时也反过来赋予我们一个任务，即必须重新学习，实现知识更新的任务。我们只是用五十年代武装起来的知识是很难做好八十年代青年的工作的。现在的青年懂得很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有些人懂，而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这方面的知识就很欠缺。我们擅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宣传又往往缺乏新的内容，不能用新的认识来补充，所以很难说服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任务。应该看到，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完全责怪一些青年不听话，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自己，要怪我们自己的水平不高。

这种思想混乱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思想界本身，而且会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目前，全世界范围正在掀起一个技术革命的浪潮。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浪潮。我们不能再落后于这个潮流，当然也不是照搬。最近紫阳同志说，前几次西方技术革命新潮流我们没有赶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关起门来搞运动。我们耽误了好几次，这一次不能再耽误。所以，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正面临着一个大改革、大发展的前夕。这样的大发展需要思想工作能够配合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求思想工作走在前头，为这个大发展开辟道路，扫清思想障碍。但是，如果前一段造成的思想混乱不澄清，不但不能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反而会为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设置障碍，拖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所以，中央不出来讲话不行，这并不是什么“粗暴的干涉”，也不是什么小题大作。百家争鸣是我们繁荣学术的一个方针，或者说是基本方针之一。但是，百家争鸣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方针。假如百家争鸣的结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损于社会主义实践，这样的百家争鸣就成问题了。所以，百家争鸣不是愿怎样争就怎样争，愿怎样鸣就怎样鸣，它应当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的发展，有助于文艺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进行。前一段出现了那样的局面，如果还说百家争鸣得不够，还要进一步百家争鸣，那就会造成进一步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经济改革也就不用了。所以，乔木同志的文章说：

“我国思想界有的同志接受了这类思潮的影响，以为发现了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陆’，而加以宣传。另一些同志在这些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虽不随声附和，也感到难以鉴别和批判，或者认为无关大体，因而采取观望态度。这样，虽然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仍然没有阻止它们的蔓延，以致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乔木同志文章写出以后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有一位老专家给乔木同志写信说，读了你的文章后有一个感觉：“汝岂好辩者，汝不得已”。这就是说，不是什么小题大作，不是什么干预，而是不出来讲话不行。

(二)

乔木同志的文章明确指出人道主义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可以说，这个论点是整个乔木同志文章的立论的根据。由于有了这种区分，这篇文章批评的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界限就划得清清楚楚了。对这个问题，乔木同志作了很多的思考，其中包括总结了六十年代以来批评人道主义的经验教训。六十年代我们曾批评过人道主义。当时，我们的观点存在着“左”的错误，认为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都不能肯定。当然，对历史上人道主义反封建、反神权的进步作用是肯定的。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的人道主义是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好象一提人道主义，就是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前一段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些人不从两种含义上区分人道主义，而是笼统地说人道主义是人类思想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也是人道主义。这样的观点显然也是不对的。这两种观点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来自“左”的方面，一个来自右的方面，但是在理论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区分两种含义的人道主义。比较“左”的观点笼统反对一切人道主义包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右的观点则全盘接受人道主义，包括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乔木同志作出关于人道主义两个方面含义的区分，是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一个理论突破，同时也找到了“左”的和右的的观点的共同的理论根源。

有的同志会问，这种区分本身有没有根据，特别是有没有思想史上的根据？我们说是有根据的。从西方哲学史上看，确有这样一些哲学家是从世界观和历史观上论述人道主义的，也有一些哲学家则偏重于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上论述人道主义，或者是同一个哲学家对这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也是有区分的。作这样的区分，有时尽管是很困难的，但不是不可以区分。比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哲学家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人性善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性是本善的，社会上出现的丑恶现象是人性暂时受到了蒙蔽。如何解决呢？他们认为关键是要搞好教育和立法，认为这是改变人性的基本杠杆。这个抓好了就可以消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人的本性就可以得到恢复。这显然是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对于历史和社会面貌的根本看法，是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但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有时又偏重于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来谈人道主义。比如霍尔巴赫就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原则是人道的原则，它包括同情、怜悯和宽容。很明显，这是属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而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对人与人相处的伦理原则的看法，而不是对整个世界历史原因的看法。所以，作这种区分在哲学史上是有根据的。

对这两种含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对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不能接受，也不能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它们之间是谈不上有批判继承关系的。如同对唯心主义哲学一样，我们可以继承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东西，但不能继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的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同样，我们对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卓越思想是可以继承的，但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思想体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不能批判继承，如果批判继承那就是搞折衷主义。但是，对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可以批判继承，而且应当批判地继承，当然不是把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原则统统拿过来，而是有选择、有批判的继承，要有我们自己的原则。今天，我们在同志内部要提倡对己严对人宽，提倡讲宽容，这是无产阶级的宽容精神。当然这种宽容精神与资产阶级提倡的宽容精神不一样。他们的宽容精神是带有虚伪性的。资本家对工人就从来不讲宽容。所以要批判地继承，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五十年代在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封建道德中没

有任何一点因素可以继承。这样讲太绝对了。道德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不能设想社会主义道德无产阶级道德与以往社会形态中的道德完全没有关系，完全要从头开始。以往社会形态的道德中，有些东西当然不能继承，但有些东西是可以继承的。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为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各个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共同生活准则，即使在敌对阶级之间也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生活准则，违背了这些准则社会就不能存在下去。比如交通规则，各个社会、各个国家都要有，否则社会的交通就乱套了。不过，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这些准则的层次比较低。比如交通法规就不涉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又是必须有的共同生活准则。所以，道德中有些东西可以继承，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也是可以继承的，甚至连法律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继承。过去有一种简单的说法，认为法不能够继承，因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封建的法是封建阶级意志的体现，资本主义的法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继承？这是就法的总的方面讲，但不是每一条法律条文都是这样。以往的法律中总有一些低层次的与统治阶级利益距离远一些的条文，这些是可以继承的。国民党的“六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中那些直接为四大家族服务的条文，当然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维持社会生活秩序所需要遵守的比较低层次的条文是可以继承的。过去我们提出“打倒六法全书”的口号，在当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看就有些问题，打倒了六法全书，其中的一些低层次的东西也不要了，那我们的一切法律条文、法律规定就都要重新制定。这是没有必要的，完全从头来也是不行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于，对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不能批判继承，对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克服“左”的倾向，又要克服右的倾向。

（三）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在前一段关于人道主义

和异化的宣传中是一个最带有概括性的命题。可以说，这个命题把宣传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思想都提出来了。所以，乔木同志文章着重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分析。这样做并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人的，针对的只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宣传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为什么说这个命题是不对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这个命题不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体系、哲学学说的界限。关于人是出发点这类提法、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很多的。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例如普罗塔哥拉就有个命题，叫做“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的存在尺度，不存在事物的不存在尺度。这个提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流传很久，很多人道主义思想家也时常引用这句话。在后来的文艺复兴中，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地主张人是出发点的思想家也是很多的。到了近代，十八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德国的费尔巴哈也都把人当作哲学学说的中心内容。费尔巴哈有一个口号：“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他的哲学的核心就是人。所以，把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或说是归结点，甚至说是核心，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的哲学的界限划清。这类提法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很早就有人提了，怎么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其次，这个命题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际形成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两大贡献，没有这两个发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就不成其为科学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和整个理论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它之所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因为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作用？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两个地方讲得很明确，一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个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实际上，马克思解决了一个多年来哲学家、思想家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

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多少年来卓越的思想家们都没有认识。要认识历史，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要从这样的基本事实开始。首先要生产，然后才能有人的其他活动，包括精神活动。人的第一个活动是生产实践。的确，人类是一个群体，但不是生物上的群体，而是社会的群体。人类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从事生产，而且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要进行生产。任何一个社会的现实的人都不能离群索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鲁宾逊那样的事只是一个故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是很少的。人一开始就处在社会生活当中，处在社会生产当中，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社会关系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从事生产，是其中的一分子。离开这一点来讲人就讲不清楚。而这一点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历史观相区别的根本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历史的解释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无非是如下几种：一种是把历史归因于上帝等神秘的力量；一种是归因于杰出人物的力量、意志，认为杰出人物的意志、力量决定着历史的发展；一种是“偶因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完全是由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关键在于发现了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有些同志提出，这样的说法是见物不见人。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见物不见人。离开社会关系讲人是讲不清楚的。张三是人，李四是人，这样的简单判断并不错，是符合常识的。但是，这样的判断对于认识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靠这样一些简单的判断不能认清张三、李四的社会地位，不能说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历史唯物主义不排斥这种一般的判断，不排斥一般的人，但反对把一般的人当作考察的出发点。马克思在好几部著作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以及《资本论》中（两部手稿是为《资